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近代文化论稿/刘圣宜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10
(岭南学丛书/左鹏军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2950 - 8

I. 岭... II. 刘... III. 文化史—研究—广东省—近代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177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罗春兰

责任校对: 张 辉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规 格: 787mm×960mm 1/16 16.5 印张 314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岭南学丛书”缘起	左鹏军 (1)
前言	(1)

第一章 共性·个性

岭南文化论析	(3)
岭南近代商品文化的发育	(11)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19)
近代风云变幻与广州文化的发展	(25)
近代广州风习民情演变的若干态势	(33)

第二章 冲突·交流

澳门多元文化的历史形态	(47)
华夷观念与律劳卑事件	(53)
19世纪中叶中英冲突的由来及结果	(61)
《循环日报》的创办与西学在岭南的传播	(70)

第三章 地域·思潮

香港与中国近代改革思潮	(83)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官僚制度的批判	(90)

岭南革命派对确立三民主义的贡献	(95)
清末实业救国思潮兴起之原因	(103)
辛亥革命与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	(111)
理财救亡论：孙中山、梁启超、梁士诒之主张	(119)
20 世纪思想界之开篇：民族主义	(128)
孙中山梁启超社会主义观之比较	(135)

第四章 时代·人物

洪仁玕与基督教	(153)
王韬与早期中西交流	
——以《循环日报》为中心	(159)
容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167)
郑观应研究	(174)
梁庆桂与晚清广东维新运动	(213)
丘逢甲：与时俱进的爱国思想	(222)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228)
师复主义及其评价	(236)
林森任治河督办时期的广东水利建设	(246)
后记	(252)

“岭南学丛书”缘起

吾国土地广袤，生民众多，历史悠远，传统丰硕。桑田沧海，文化绵延相续，发扬光大；高谷深陵，学术薪火相传，代新不已。是端赖吾土之凝聚力量者存，吾民之精神价值者在。斯乃中华文化之壮举，亦人类文明之奇观。抑另观之，则风有四方之别，俗有南北之异；学有时代之变，术有流别之异。时空奥义，百转无穷；古今存续，通变有方，颇有不期而然者。

盖自近代以降，学术繁兴，其变运之迹，厥有两端，一为分门精细，一为学科综合。合久当分，分久宜合；四部之学而为七科之学，分门之学复呈融通之相，亦其一例也。就吾国人文学术言之，旧学新学，与时俱兴，新体旧体，代不乏人。学问之夥，盖亦久矣。是以有专家之学，许学邴学是也；有专书之学，选学红学是也。有以时为名之学，汉学宋学是也；有以地为名之学，徽学蜀学是也。有以范围命名之学，甲骨学敦煌学是也；有以方法命名之学，考据学辨伪学是也。外人或有将研究中国之学问盖称中国学者，甚且有径将研究亚洲之学问统名东方学者。是以诸学之广博繁盛，几至靡所不包矣。

五岭以南，南海之北，或曰岭表岭外，或称岭海岭峤；以与中原相较，物令节候殊异，言语习俗难同，盖自有其奇胥者在。岭南文化，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活动于斯；汉南越国之肇建，自成其岭外气象。唐张曲江开古岭梅关，畅交通中原之孔道；韩昌黎贬阳山潮州，携中原文明于岭表。宋寇准苏东坡诸人被谪之困厄，洵为岭隅文明开化之福音；余靖崔与之等辈之异军突起，堪当岭外文化兴盛之先导。明清之岭南，地灵人杰，学术渐盛。哲学有陈白沙谿甘泉，理学有黄佐陈建，经史有孙贲屈大均，政事有丘濬海瑞。至若文学，则盛况空前，传扬广远，中土嘉许，四方瞩目，已非仅岭南一隅而已。明遗民诗家，自成面目；南园前后五子，各领风骚。韶州廖燕，顺德黎简，彰雄直狷介之气；钦州冯敏昌，嘉应宋芷湾，显本色自然之风。斯乃承前启后之关键，亦为导夫先路之前驱。晚清以还，诸学大兴，盛况空前。其颖异者，多能以先知先觉之智，兼济天下之怀，沐欧美之新风，栉西学之化雨，领时代之风骚，导历史之新潮，影响远播海外，功业沾溉后世。至若澳门香港之兴，则岭海之珠玉，亦华夏之奇葩；瞭望异邦，吾人由斯企

足；走向中国，世界至此泊舟。故曰，此诚岭南之黄金时代也。然则岭南一名之成立，则初由我无以名我，必待他者有以名我而起，其后即渐泯自我他者之辨，而遂共名之矣。

晚近学者之瞩目岭南，盖亦颇久矣。刘师培论南北学派之不同，尝标举岭南学派，并考其消长代变；汪辟疆论近代诗派与地域，亦专论岭南诗派，且察其时地因缘。梁任公论吾国政治地理，言粤地背岭面海，界于中原，交通海外；粤人最富特性，言语习尚，异于中土；盖其所指，乃岭南与中原之迥异与夫其时地之特别也。梁氏粤人，夫子自道，得其精义，良有以也。斯就吾粤论之，其学亦自不鲜矣。有以族群名之者，若潮学客家学；有以宗派名之者，若罗浮道学慧能禅学；有以人物名之者，若黄学白沙学。晚近复有以各地文化名之者，若广府、潮汕、客家、港澳，以至雷州、粤西、海南之类，不一而足；且有愈趋于繁、愈趋于夥之势。

今吾侪以岭南学为倡，意在秉学术之要义，继先贤之志业，建岭南之专学，昌吾土之文明。其范围，自当以岭南为核心，然亦必宽广辽远，可关涉岭南以外乃至吾国以外之异邦，以岭南并非孤立之存在，必与他者生种种之关联是也。其方法，自当以实学为要务，可兼得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之长，亦可取古今融通、中西合璧之法，冀合传统与现代之双美而一之。其目标，自当以斯学之成立为职志，然其间之思想足迹、认识变迁、求索历程均极堪珍视，以其开放兼容之性质，流动变易之情状，乃学术之源头活水是也。倘如是，则或可期探岭外之堂奥，究岭表之三灵，彰岭峤之风神，显岭海之雅韵也。

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学当奉圭臬；学而有法，法无定法，性灵原自心生。然何由之从而达于此旨，臻致此境，则时有别解，地有歧途；物有其灵，人有其感；惟所追慕向往者，则殊途同归、心悟妙谛之境界也。吾辈于学，常法朴质之风；吾等之怀，恒以清正为要。今此一名之立，已费踌躇；方知一学之成，须假时日。岭南学之倡导伊始，其源远绍先哲；岭南学之成立尚远，其始乃在足下。依逶迤之五岭，眺汪洋之南海；怀吾国之传统，鉴他邦之良方；愿吾侪之所期，庶能有所成就也。于时海晏河清，学术昌明有日；国泰民安，中华复兴未远。时势如斯，他年当存信史；学术公器，吾辈与有责任。

以是之故，吾等同仁之撰著，冠以岭南学丛书之名目，爰为此地域专学之足音；其后续有所作，凡与此相关相类者，亦当以此名之。盖引玉抛砖，求友嚶鸣，切磋琢磨，共襄学术之意云耳。三数书稿既成，书数语于简端，略述其缘起如是。大雅君子，有以教之；匡其未逮，正其疏失，是吾侪所慕望且感戴焉。

左鹏军

丁亥三秋于五羊城

前 言

中国近代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时期，又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对这一时期文化史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然而，这一研究目前还是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导致我们对这一段文化史的发展过程还不能全面认识和详细评价，对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缺乏有力度的揭示。由于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一个庞大的题目，而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笔者依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兴趣，把研究目光锁定在近代岭南地区。这个地区是西学东渐的前沿，得风气之先，不但吸收西方文化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岭南人对如何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也做出了最早的探索和独特的贡献。近代岭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从岭南文化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是它获得快速发展和质的提升的阶段，是它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外部力量的侵入、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风云成为文化变革的催化剂。艰难的转型中，岭南文化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经世致用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逐步实现文化的改造、更新和提高。近代，是岭南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豁口。岭南人在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时刻，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和敢于创新的努力。思想观念的转化是整体转化的前提，具有破冰的意义，近代岭南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启蒙资料，也产生了近代最为杰出的思想领袖。可以说，近代是岭南文化形成和发展中最为鼎盛时期，也是岭南人在文化上对中国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时期，值得大书特书。

在广东地区，岭南文化研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而至今不衰的热点问题，笔者有幸躬逢其盛，参与其中，不想辜负大好时代给予的机会，故有此书之写作。本书收入笔者从 1985 ~ 2007 年历年研究岭南近代文化和人物的心得与收获，其中部分章节曾以论文的方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现把它们归类排列，分为四章：第一

章宏观综论岭南文化的属性、内容、特点、发展变化等问题；第二章专题研讨岭南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第三章分析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改革思潮的影响与作用；第四章对发生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的岭南近代人物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孙中山等进行个案考察。在此基础上，本书从多方面分析了岭南成为近代维新、革命思想发源地的时代与地域渊源，展示了岭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所论仅是初步的、很不成熟的意见，所述亦仅为岭南近代文化中很小的几点。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岭南文化的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刘圣宜

2007年9月26日

岭南文化论析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一词的初见，在中国文献中可追溯到西汉，原本是指古代《诗》、《书》、《礼》等典籍以及文物典章制度和礼仪风俗，还有就是指与武力相对应的教化。可以说，文化就是文治教化，即以中国固有的礼乐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对人进行制约和感化。这种理解在中国一直保持到近代。

“文化”一词在近代有所变化，原因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西学东渐，英语 culture 一词被作为“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西方学科的一个专有名词引进中国，翻译为中文，这个词就是“文化”。既然“文化”是一个西方的术语，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英国的人类学之父泰勒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不过，麻烦的是，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1920 年以前有 6 个不同的定义，到 1952 年竟然增加到 160 多个。究竟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人们大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使用文化一词。

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有关文化的概念传入中国后，近代中国学人在文化的释义方面已经接近西方。他们把西方传入的“文化”称为大文化、广义的文化。它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人类在物质和精神生产中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是这种活动的结果。而中国原有的“文化”可称为小文化或狭义的文化。1979 年版《辞海》“文化”条目对其含义作了这样的界定：“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个界定，应该成为我们对文化的一个共识，成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前提。

二、岭南文化性格

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区域性是文化存在的三个基本样式。以

民族性来说，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分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在岭南的延伸；以时代性来说，岭南文化可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等时段，而以近代的岭南文化最具瞩目的个性和时代精神；以区域性来说，岭南文化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南方山河海文化。对于岭南文化，近人有以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概括之，虽然颇能显示岭南文化的特色和价值，但我以为不够全面。岭南地形复杂多变，山地和丘陵所占地表在 50% 以上，山丘文化是不能忽视的，只是开发较晚，还未引起注意而已。

作为一个区域，岭南地区位于中国最南方，一般是指南岭山脉以南，包括广东省、海南省、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还有香港和澳门。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岭南置桂林、象、南海三郡。粤西属桂林郡，海南及南路一带属象郡，广东省大部属南海郡。南海郡治在番禺（今广州）。

南岭（又名五岭）横亘在粤北和湖南、江西两省之间，最高峰海拔为 1 902 米。它把岭南与中原分隔开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两广又称为岭表和岭外。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崇山峻岭像一道天然屏障，影响了广东经济文化与中原的交流发展，直到唐代，岭南还被看做化外之区、瘴疠之乡，是被朝廷贬逐的官员流放之地。唐代开元年间一个广东籍的宰相张九龄，主持开凿了南岭山脉的大庾岭山道，才使岭南和中原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古代岭南开发较中原为晚，农耕文化自然比较落伍；但它又因为边沿化而得以较为自主和自由地生长，因而形成了十分独特的、与岭北差别较大的区域文化。

我们在研究岭南文化的时候，总是首先要界定它的区域特征，把它和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异显示出来。岭南文化的特征，不同时代自有不同的表现，而不同人群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路和表达方式分别进行了多样性的归纳和说明。笔者对古代岭南文化研究不多，现只就近代岭南文化的特征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岭南文化的成分比较复杂多样，是一种多元杂交和共生的文化。从源流方面来说，主要的成分有来自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和荆楚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南洋文化、来自西方欧美国家的西洋文化和岭南原本固有的土著文化。如果以岭南人的民系进行分类，也可以把岭南文化的成分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以生产方式分类，又可以分为农耕文化、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最具岭南文化特点的文化成分是商业文化，还有其他区域没有或少有的华侨文化与港澳文化。

商业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分，值得特别注意。它对岭南文化的个性起着主要作用，是形成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岭南向来重商，早在汉代，广东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这两个最靠海的市镇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港口。

唐代，广州崛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宋代，广州更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更不用说，按梁启超的说法，在世界地图上看广东，广东是“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由于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殊原因，广州外贸发达，是当时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一个最大的商埠，所谓“商贾辐辏，海船云集”，以致中国南方各省有上百万居民依靠广州这个市场为生。到辛亥革命时期，广州商业已形成100多个行业，当时广州大多数报纸的背景是“商办”，反映商人的利益、要求和心态，商业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对社会的影响很深广。

华侨文化在岭南近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欧美国家的交流融合从来都是一种双向交流运动，而作为民间交流载体的就是华侨，华侨对祖国的贡献是巨大的，华侨文化是流动的、活泼的文化。

港澳文化是岭南近代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港澳两地，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和结果是很特殊的、很有创意的，对岭南腹地的辐射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有了商业文化、华侨文化和港澳文化三种特色成分的近代岭南文化，其个性风格自然倾向于趋新、求实和灵敏多变。笔者在1991年广东学术界举行的“岭南近代文化特点研讨会”上提出，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新”、“实”“活”、“变”^①。

“新”就是趋新和创新，乐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创造新文化，表现出一种先驱文化的特质。岭南人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成为先驱者和开拓者，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由于求新而领先于人。

“实”就是注重实效与实利，不尚空谈。有益的东西积极吸取，为己所用；有害的坚决抵制，毫不含糊。对外来人口和事物采取开放兼容的态度，也是务实的表现。封闭与开放、排斥与兼容，在岭南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但岭南人最终明白了封闭是不智的，该开放时要开放，该兼容时就兼容，也就是实事求是，不为条条框框所囿，以最大价值为依归。

“活”就是生动活泼，反映迅速与灵敏，富有活力。所谓“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岭南文派、诗派、画派，广东戏剧、音乐、建筑、货品和食品等都散发出一种生猛鲜活的灵气。

“变”就是不停滞、不固守，应变能力强，变化发展，与时俱进。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和融合中，岭南人不断扬弃、变革与重构，显示出一种进取的态势，从而使岭南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

岭南文化是个性鲜明的区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它的个性显然是相对

^① 华茗：《岭南近代文化特点研讨会综述》，载《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本土文化非常独特，方言、婚姻、丧葬、节令、饮食、居住等习俗因其怪异而被中原人视为蛮风夷俗，但换一个角度，又可把其视为合理和高明的生活方式；原因之二是它大量吸收、融合了异域文化，特别是南洋和西洋的文化；原因之三是作为华夏正宗的中原文化，在岭南传播时也发生了不同时代的流变，在表现方式上更有自己的面目。

三、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

岭南文化既然是属于大中华文化系统的一种区域文化，那么它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便是十分密切的，可以说是母体与子体的关系。当我留意别人如何总结岭南文化的个性特点时，往往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所总结出来的特点并不是岭南所特有，而是整个中华文化所共有的，比如，家族本位性、经验直观性、动态发展性，还有传承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等。这说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基本内涵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岭南承传了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是长久而深入的。秦统一中国，在岭南推行中原行政建制；汉初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也与汉朝建制相同，中原的王朝政治及其文化的触角伸入岭南。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两汉时期南下苍梧聚集西江流域的学者不遗余力地宣教中原文化，而岭南人则热心学习中原文化。广信人陈钦、陈元父子治左氏春秋之学，成为岭南经学的开山。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改造了岭南土著越族的刀耕火种和水耕火耨。唐代大诗人韩愈被流放到岭南，先贬为阳山县令，再贬为潮州刺史，所到之地受到人们长久的崇拜。文天祥、包拯等中华精神道德的楷模也在岭南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南宋和南明的流亡政权来到岭南，带来了成熟的典章制度和礼仪文化，以及大量文化素质很高的移民。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今粤人大抵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就是说岭南受到来自中原移民的“流风遗韵”、“衣冠习气”之熏陶沾染，民风“庶几中州”矣。可以这么说，从历史的承传来看，岭南文化属于大中华系统，它与中原文化的共性有时甚至比它们之间的差异还大。虽然岭南偏于中国南方一隅，但历代都有中原文化的精英进入岭南地区传播中原文化，为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养料，提升了岭南文化的品位。宋明两代更是中原文化大举南下并成为岭南文化的主宰时代。

岭南上层文化人宗经入仕，也引领着岭南的学术、教育和文学向中原地区靠拢。近代岭南的学术文化在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广东最高学府——学海堂的主导下，从空疏转向切实，出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在经学、教育以及大型丛书的出版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使得岭南人士以秉承中华学术正统而深感自豪。张之洞在1884~1889年间出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广雅书院，以读经史、习修辞为主

要学习内容，造就经世致用之才；又创办广雅书局，大量刻印经史类古籍，使中华文化典籍在岭南学界广为流布。张之洞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旗，以示中华学术的正宗地位不可动摇，岭南学术的代表人物如张九龄、陈白沙、湛若水、梁廷枏、张维屏、陈澧、朱次琦、康有为等，无不以他们在经学中的地位自重。参与科举考试，进身仕途，进入中原文化圈，成为读书人追求的目标。在他们那里，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是分不开的，所谓“岭学”，不过是岭南人研究经学的历史和成就。

岭南的俗文化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岭南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原汉人的血统。自从陈澧作“广州音说”，力证粤方言最接近隋唐古音后，客家人也不甘落后，纷纷撰文证明客家话根源自中原古音，潮州人则奉韩愈为文化之祖。这些都表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源、同根、同类，是大中华系统的文化。

近代新型知识分子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主文化自由主义，但出于民族统一的历史责任，他们希望建立起一种超地域、超阶层的中国文化，以共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取向和文化内涵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岭南人更加视中原文化为自己的文化主体，岭南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向化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积极意义已经超乎文化之上。

四、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

岭南自古便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但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岭南并与岭南文化进行初步融合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认识世界成为岭南人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课题。他们在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发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提出“师夷长技”，提出引进西学，使岭南文化得到新的营养而推陈出新、转型和发展。香港、澳门的割让和租借，也使它们成了西方文化进入岭南的基地。西方的经济思想、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已经通过港澳展示在岭南人的面前。岭南学子也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更多、更早地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西方先进文化对岭南文化走向近代化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最多的岭南人，进行了西方文化的介绍引进和中西文化结合最初步的、持续的实践。

鸦片战争时期，岭南学者梁廷枏于 1846 年写成了堪称当时国内质量最好的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四说》，包括了美国史、英国史、与清朝有朝贡关系的从海道入贡的国家关系史和耶稣教传道史，开创了中国人编写外国史的先例。他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准确地解释了美国的联邦制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中

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根据他在香港居住所获得的西学知识，著成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一方面在思想上宣告了历代农民革命指导思想——传统平均主义的没落；一方面成为中国即将兴起的近代化思潮的先声。

洋务运动时期，王韬、郑观应、何启等突破洋务派师夷之末的局限，深入探究西人立国之本，大力鼓吹议院制，并融合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宣扬“君民共主”的新观点，使之成为此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改革主张的生长点。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从中西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世界观，并进而用西学革新孔子学说，形成一整套变法的理论和主张，对中国出现第一次近代思想解放潮流起了重大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融合中西文化，从宏观的视野对世界潮流予以深刻的理解和阐述，又从中国的视角对如何走自己的路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创立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和理论体系的三民主义，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五四运动时期，留日归国青年杨匏安 1919 年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续多天发表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文章，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高度评介马克思主义是西欧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最科学、最光辉的学说。他与李大钊并称为中国南北两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镇，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进步潮流中的主导地位行将被更先进的思潮所取代。

先驱者们艰辛而卓越的努力，终于打破了中华古代文化停滞落后的僵局，使新的思想文化源源不断地涌现成为不可改易的现实。综观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在几个最重要时期新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出在岭南，这与岭南人善于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是分不开的，这是岭南文化在近代能有超越于内陆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岭南文化更新进步的重要因素。

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岭南人主动地走向世界，吸取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加快了自己前进的步伐，有利于岭南文化的更新和进步。

五、岭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

区域文化是生长于斯地的人类为适应其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而创造的生活方式之总和，对于本区域的人来说，文化也是他们从祖祖辈辈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相应的行为方式。文化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倾向和时尚，思想观念和行事习惯亦可能大不相同，甚至相反。任何一种

成熟的文化都不是单纯的，在它内部包含着矛盾与差异、理性与非理性、封闭与开放、排拒与吸收、保守与激进、尚武与崇文等，这些观念和行为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渗透的，共存于一张大网之中。在岭南文化这个大网里，找寻对我们今天还具有重要价值的优秀因子，可能就是研究岭南文化的目的和意义吧。那么，岭南文化的价值和优长表现在哪里呢？

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即竞争精神、包容胸怀、创造能力和务实品格。

（一）竞争精神

梁启超在 20 世纪开端的时候说：“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既成铁案矣。”当时，封建专制统治在各个领域内造成缺乏竞争以及竞争形式不发达的状况阻碍着中国的发展，梁启超从西方理论和经验中吸取“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的思想，代表了岭南知识界打破传统的勇气。其实，在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里，特别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压迫，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十分需要竞争精神。郑观应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第一个发出了“商战救国”的口号，不畏强梁，“与外人商战”，是又一个例子。从古到今，在每个时期进入岭南的移民们，当他们来到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从零开始，为了寻找新的活路，为了开创美好的未来，就必须抛弃依赖思想，自立自强，敢于拼搏，因此竞争意识空前强烈。有竞争，社会能快速进步，岭南人也就活得更精彩。

（二）包容胸怀

岭南自古是商业发达之区，与海外的交流两千年来基本不绝，对外来文化自然包容了很多。佛教、伊斯兰教在东吴时期传入，天主教和新教在明清时期传入，鸦片战争前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在澳门地区共生共存 300 多年，交织着多姿多彩的欧洲和亚洲的风土人情。近代岭南人在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同时，理智地向对手学习先进科技和政治制度，对有益的东西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是包容心理的典型体现。

岭南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两晋时期、两宋时期、明末清初，都有大批岭北人民南迁避乱。他们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习俗，如果互相之间没有包容的雅量和胸襟，如何能和平地共存于同一个地方？所以，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就在不断地接纳移民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直到今天，从全国各地来到岭南参与建设的外来人员，谈到他们对广东这个地方的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包容性比其他地方更强。不论什么人，只要有真本事，就不难在岭南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空间，也容易有出头之日。对外来者一视同仁，提供的发展机会较多，有这

样一种宽松的环境，能够吸引众多人才前来施展身手。

有容乃大。有了包容的胸怀，才有文化的丰富、多元、博大与和谐。

（三）创造能力

人的创造能力如何才能发挥出来？首先要思想解放；其次是尊重个性、发展个性。岭南处于中国南部边沿地区，远离皇权中心，受到的思想束缚相对较少，行动自由度较大，岭南人富于冒险精神和自主意识，喜欢自行其是。从北方迁徙到岭南的移民，在性格上必然具有冒险因子和开创的勇气。特别在19~20世纪间，中国正处于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岭南人的创造能力得到适时的发挥。

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结合中国儒家伦理，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拜上帝教，发动了一场以创建人间天国为理想、席卷中国的农民起义。康有为把西方进化论与儒家公羊三世说融合，构建自己的历史进化论，倡导变法维新。他撰写的《大同书》，对一切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进行无情的批判，将大同之世设计为人人平等、自由、独立的新型社会，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孙中山的开拓和创新精神更强，他说：“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虽然反清革命有很多“不知”的前途，但他并不因为“不知”便不去奋斗。他倡导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岭南人在很多方面都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兹不一一列举。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岭南人又以争当排头兵为荣，乐于喝“头啖汤”。

创造能力是各种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创造力对振兴中华具有决定性意义，最需要继承和发扬。

（四）务实品格

岭南人是特别务实的，脚踏实地、注重实干，讲求实效是他们做人做事的原则。举凡创业有成之人，莫不如此。近代著名实业家出在岭南的不少，如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和莫仕扬等便是实干典型。他们均出身平民，从低级职务做起，勤奋务实，一步一步地成就了大事业。郑观应所著的改革名作《盛世危言》出版后，以其所展示的广博的西方知识、深刻而敏锐的见解、全面而系统的改革主张、实事求是的精神、直言无隐的勇气，在中国朝野引起了强烈反响，张之洞誉之为“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对中国富强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作用。

岭南民风讲求实际，不尚空谈，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认为以事实说话最有力，务实品格的确非同一般，甚至被今天的人讥为“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这个比喻相当生动贴切，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岭南文化的弱点，即不善于总结经验，

把它提升为理论。什么时候岭南人克服了这个缺点，岭南文化的品位肯定还将会提高一大步。

岭南近代商品文化的发育

商品文化，是岭南近代文化中的一个勃兴和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的开端，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商人阶层及其文化的发育。由于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殊原因，广州外贸发达，是当时中国和东亚的一个最大的商埠，中国南方各省有数百万居民依靠广州这个市场为生。到辛亥革命前，广州商业已经形成 100 多个行业，1904 年成立广东总商会，当时广州大多数报纸的背景是“商办”，反映商人的利益与心态，对社会的影响很广很深。因此，研究岭南近代文化不能忽视商品文化，而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很薄弱的，下面拟作一初步探讨。

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商品意识的发展

岭南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 16 世纪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的开辟有直接关系。岭南自古是个商业重镇，但在 16 世纪前，其海外交通局限于南洋和印度洋，最远达非洲东岸。新航路开辟以后，岭南与欧洲、美洲开始了往来。这样，不但贸易范围扩大了，而且进入了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相联系的新阶段。

17 世纪时，新形式的工业开始在中国、印度及欧洲出现，与旧式手工业并肩发展。中国景德镇及广东窑厂、印度的阿麦达巴德的纺织工场和法国哥白林的挂毯及家具工场，都逐渐改为以分工式生产，采用了工厂的集体生产技术来取代传统的乡村作坊形式。同时，更厘定及划一了部分产品的质素及款式，以便大规模地成批生产。新产品亦接连涌现，它们的设计不再被传统款式所规限，受外界市场需求所左右。这些商品的设计及改良，标志着近代商品意识和商品文化开始产生了。这种商品意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鸦片战争后，广州的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次鸦片战争的条约开放了中国沿海关闭着的闸门，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市场，在无情的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支配之下，洋货逐渐占领了广州的部分市场。岭南人的商品意识和商品文化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 世纪 60 ~ 90 年代，除了洋布、呢绒、煤油的大量进口外，在广州的大街